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月 第44卷第1期 Jan. 2014, Vol. 44, No. 1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 ——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张文喜,包大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关键词: 市民社会;辩证法;马克思;卢梭;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14)01-0015-06

市民社会的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以城邦共同体的定义跃入了政治哲学史,但是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形态的演变,从14世纪开始,市民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概念才开始具有了城市自治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含义,并与政治国家相对立。当怀着古典主义情怀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试图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功的前夜从正反两方面批判市民社会的同时,他无意中实现了辩证法在政治哲学中的不自觉运用。然而,只有当黑格尔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辩证法自觉运用于市民社会批判中,才得出了关于市民社会真正“历史主义”的概念。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图式共同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而矛盾的和解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实现,并通过实践回顾了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市民社会概念神秘主义的一面终被解蔽(Unverborgenheit);并在政治经济学中被依寓于现实生存而呈现(Anwesenheit)。

一、卢梭:市民社会的预见性批判与辩证法的不自觉运用

卢梭思想的辩证性在于,其思想既是启蒙精神的产物,也是启蒙精神的第一个掘墓人。自卢梭以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2002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XNL007)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喜,男,浙江东阳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降,“历史不是神义的证成,而是悲惨和腐败构成的故事”^{[1] (P191)}——成为了政治哲学史中难以扭转的市民社会批判潮流。卢梭政治哲学的革命性远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诉求,其理论所指也不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胜利。没有理由否认,“卢梭是从左翼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他攻击新兴的资产阶级,并非为贵族或教会招魂。”^{[2] (P5)} 当历史的帷幕即将为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卢梭预见性地揭示出了资产者普遍统治下的不平等和道德异化。卢梭的市民社会批判是造就“真正人格”^{[1] (P195)} 的努力,从三个方面勾勒出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本质和最终解决内在矛盾的政治道路。

首先,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历史的偶然产物与道德堕落的产物。狭义地看,卢梭的“自然状态”在二论中实指“原初状态”,是对人类政治伦理状况所做的历史考察,并借此为政治伦理作了原初设定。关于私有制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卢梭将其视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偶然结果,是非公共性的、不可逆的历史困境,注定将“导致对市民社会及其一切基本制度的激烈批判:包括家庭、私有财产以及法律”^{[2] (P13)}。尽管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似有好古讽今之嫌,但他却在社会契约论中彻底否定了“回归”自然在未来政治制度构建中的可行性。因为自然状态作为赘留于个体理性中,表现为“自然法”面前个体的平等性,每个人“自己是保护自己的法官,并是自己的主人”^{[3] (P352)}。故而,卢梭基于自然法所确定的个体意志的绝对性,在市民社会阶段“根据自然秩序,个人意志总是强于公意。”^{[3] (P401)} 这与黑格尔关于个体意识的论述产生了共鸣。

其次,根据对布尔乔亚(Petite bourgeoisie)在政治伦理上的全面批判,揭示出市民社会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卢梭对布尔乔亚的批判不仅在一论与二论中被凸显,更是通过在社会契约论中设定政治权威来表达他对布尔乔亚的不信任。“公民”在卢梭政治哲学中具有沉重的公共德性负载,公民只能是那些自觉让渡部分自由并尊重公意的政治个体,自私和虚荣的布尔乔亚不配拥有公民的称号,因为布尔乔亚“把自己的利益与公益区别开来,他的利益需要社会的存在,因此他剥削他人而同时又依赖他们。”^{[1] (P194)} 布尔乔亚的自私性被市民社会最大程度保护了,却将公共利益作为了代价。在卢梭看来,对公共利益的藐视必然与政治德性相悖,因此资产者一方面与“人”对立,另一方面亦与“公民”对立,不仅缺乏自然性和独立性,而且缺乏公民的公益精神和无私精神”^{[2] (P5)}。

最后,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维护公意的国家政体,并以政治权威扼制市民社会中布尔乔亚之自私性对公意的破坏,完成个人自由与政治德性的辩证统一。卢梭的市民社会批判,最终指出市民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低等人不可避免的普遍统治”,这种统治将“可能导致人类永久的堕落”,他将这低等人“识别出来并加以命名:资产者(bourgeois)”^{[1] (P193)},资产者之所以被卢梭指认为是低等的阶层,是因其自然需求的彻底丧失和被欲望的完全控制,进而与公共利益对立。因此,市民社会的公民不可避免地,将“终日辛劳,一直辛劳到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以充当奴隶为荣”^{[4] (P197)} 因此卢梭将塑造出合格公民和新的社会文化寄期望于社会契约论的政治设计,他坚信“好的社会制度是能改造人的制度”^{[3] (P249)}。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的政体,将是拥有强大政治权威的有机体,是“一个强大的整体并有着极高的权威…能完全阻止个人或寄生阶层的任何旨在脱离整体的运动。”^{[5] (P91)},“寄生阶层”则明显地意指即将获得历史统治权的资产阶级。

卢梭对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市民社会国家甚为满意,自信能够通过以法权的形式实现平等和自由。但事与愿违,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共和国,“契约所形成的公共权力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使富人占有他们的财富,使穷人占有他们的贫穷”^{[6] (P165)}。黑格尔指出了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统一的过于简单的逻辑跳跃,而契约本身必然“包含着意志(从而是他人的意志)的环节”^{[7] (P81)}。

二、黑格尔: 革命性与抽象性共存的辩证设计

卢梭对市民社会的道德主义批判,其革命性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翌日的蜕变中被耗尽了,他低估了个体欲望和需求之间的鸿沟。社会契约论从消极自由出发,期冀个体精神的解放,黑格尔却指出精神解放必须要以伦理解放为前提,而后的实现则“一定要剧烈地变革社会秩序…要把所有随心所欲一扫而空。”^{[8] (P50)}。故而相较卢梭,黑格尔对个体之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他继承卢梭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的探讨,认同卢梭基于自然德性的自由观,即自由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7] (P335)}。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矛盾进行的理性主义探讨,注定革命性与软弱性、现实性与抽象性的矛盾将在其市民社会概念中得到延续。

一方面,通过将自我意识复归于劳动与欲望,肯定个体自由与平等,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获得了革命性的外观。相对于卢梭的自然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唯心主义地定义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的结果。他认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市民社会的个体理性中被确立,而个体理性的统一则最终抽象为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因此“如果把国家想象为各个不同的人的统一,亦即仅仅是共同性的统一,其所想象的只是指市民社会的规定而言。”^{[7] (P197)}。黑格尔通过对自我意志结构中欲望和劳动的逻辑前提意义的强调,扬弃了卢梭对于欲望和需求这对矛盾的固执。因而使得逻辑中的市民社会伦理解放得以可能,而“伦理是自由的理念。”^{[7] (P193)}。黑格尔所定义的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7] (P197)},个体利益成为了不可怀疑的主观自由标准,但是又辩证地与普遍利益统一,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普鲁士,该理论毋庸置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另外,黑格尔通过辩证法又确认了市民社会当中个体的交往和劳动的普遍形式,并将其作为“市民社会的第二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特殊的人有联系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9] (P123)}。启蒙精神的革命性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被论述得更为彻底,原先被孤立化的、诗化的、英雄化的革命性终于在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以及其相互关系中被确立。同时,特殊利益在市民社会不仅表象为了个体的自我持存,更表象为了个体在欲望的交互关系以及追求承认、寻求合作的社会经济运动,因此黑格尔把“同业公会”看作是构成国家的基于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根源。

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为良心自由和平等主义的政治理念做了准备,个体的主观自由尽管仍然在其理论中始终与客观自由之间存有张力,但是主观自由的自然合法性已经在各个方面被确立了。市民社会是一个特殊利益宰制的历史状态,与卢梭的悲观论调不同,黑格尔认为对“普遍承认”的渴求将迫使所有政治公民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黑格尔确证了市民社会的合理性,即作为现代国家理性运动的结果,并使得“合理的制度取代杰出个人的行为”^{[10] (P749)}。

另一方面,通过将市民社会中的主观自由与国家的抽象、客观自由同一,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却自我消解了革命性。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逻辑运动的环节,而历史的主题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展现绝对精神,通过历史的进程逐渐使精神达到自我意识,即精神对于自身自由本质的意识。“特殊与普遍在国家中的统一是一切事物的基础”^{[9] (P261)},这个“现代国家”不是市民社会中个体自由和劳动抽象的结果反而被视作了二者的前提。因此,市民社会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是具有终点意义的历史状态,市民社会对于自身的回复运动实质上背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为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蒙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黑格尔对于现代国家的具体职能的描述却并不是模

糊和晦暗的,因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越是盲目地沉浸在自私的目的中,就愈加需要这种调整来使它回到普遍物”,因此“现代国家”就必须毫不怀疑地“使危险的震荡得以缓和,使冲突由无意识的必然性而自动平复的间隔期得以缩短。”^{[7] 1217} 特殊利益和主观自由对公共义务的拒斥,是造成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根本原因。霍布斯认为“意志自由是与法、或与一切义务与责任相矛盾的。因此,当人们进入市民社会并同意服从法的规定,他们的自由就必定要受到限制。”^{[11] 184-86};卢梭进而期冀通过社会契约的政治权威解决了这一难题;黑格尔最终将社会的普遍性归入了劳动和欲望,而“现代国家”必须通过主观自由和特殊利益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性只有通过自由意志这个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市民社会个人自由和公民义务的统一在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中被辩证地得到了论证。

但是这终究不能否认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抽象了个人自由和特殊利益,而使现实性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塞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法的内涵当中。市民社会的伦理价值和逻辑起点是“自由意志”,但是这种“自由意志”的实现始终只能以作为第二性的、国家之表象的形式得到实现,即市民社会只是“法的体系实现了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性的那精神的世界”^{[7] 110}。

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彻底运用与市民社会的现实表述

卢梭以降,启蒙精神已然成为文化的宰制,其革命性与人道性被资本时代的文化工业偷换了内涵。因此,“从卢梭道德主义的、博爱主义的政治学方法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之所以长期以来被模糊,皆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其独创性的名言的盗用以及对人民主权准则所作的相应的贬低”^{[5] 166}。马克思扬弃了前人“解释世界”的理论方法,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2] 132}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则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也就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定义。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卢梭与黑格尔未竟的批判,并通过异化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超越了一切局限于政治哲学范畴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卢梭未竟的尝试和理想,是卢梭政治哲学辩证法的最终展开和实现。卢梭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是早熟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被识别。虽然“在他那时历史条件还未成熟,但他用他非凡的预见力勾勒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首要 and 基本的章节。”^{[6] 174} 卢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停留于道德主义的“资产者批判”,而不是实践层面的“资本批判”。尚在潜伏中的资本异化只能被卢梭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不可避免地使得卢梭理论的批判性将被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用新的意识形态来规避。因此,德拉-沃尔佩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对卢梭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解释形式地而且不合时宜地将社会主义问题归结为《人权宣言》…不论卢梭学说的精神如何充满《人权宣言》,这也已经在历史上被资产阶级革命耗尽了。”^{[5] 192} 卢梭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设计论证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其古典主义的人道隐忧,一方面,他颇为唯物主义地认识到人类总是停留在肉体存在的状态,因此是“完满的单独的整体”^{[3] 1381},并以此来进一步揭示市民社会中自私性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公共利益的事实,而马克思则是最终将这种自然权利——不仅是市民社会阶段的自私权利把握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3] 167} 另一方面,卢梭将资产阶级直接冠以“下等人”的身份来进行道德批判,却并未透视到资本这一历史性力量,只有当资本成为社会历史性的普遍中介物,才使得“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被抹去,才使得“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

自力挣得的自由。”^{[13] (P275)}

第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体现了辩证法在其政治经济批判中的彻底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中首先得到彻底运用的成果,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刨去了曾经覆盖在道德、国家与法之上的所有神秘主义的抽象概念,使得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最终被扬弃的历史动力被最终显现。劳动与欲望虽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普遍性的意义,却仍然不被视为决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3] (P122)}。辩证法的伦理价值不能停留于针对绝对精神逻辑运动的解释,而应该被彻底运用并揭示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历史道路。但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其“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4] (P10)},所谓的“现代国家”通过对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同一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合理性,并具有了神圣性的外在表象,国家是作为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填补而被历史赋予了必然性。然而,从人类自身变革与环境变革的实践出发,市民社会只能被唯物主义地从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式来理解,即作为一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同时也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5] (P88)}。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镜像性的社会存在,而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整体的物质基础,只能是被市民社会决定的宗教、国家与法。另外,黑格尔事实上已经几乎触及了市民社会阶段个体依赖于物质而获得的独立性的现实,甚至清晰地认识到了人的实践与劳动对于物质与环境的能动的一面,即“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8] (P48)},但是他却并没有就此推出通过实践而实现个体自由的政治理念,而是把市民社会及其“现代国家”当作历史目的之完成,并由此将人格权的本质理解为物权。关于人与物质的关系,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哲学,最后只有通过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而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中,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性,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14] (P32)}

最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共产主义理念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范畴的最终超越和扬弃。市民社会在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并不具有自我扬弃的现实力量,故而其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或是为了给市民社会自我改良创造条件,或是无法想象超越市民社会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古典唯心主义的、道德主义的对于市民社会的定义,与国民经济学家们对于市民社会的论证一样,都有意无意地欲图把“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3] (P5)}现代政治哲学的伦理价值并不在于对现实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的论证当中,而是在于对个体自由解放——回归每个人之生存境遇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之探讨。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资本批判的结果,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愿景、一个能够被哲学掌握为批判武器的阶级以及一个真正实现辩证运动而非目的论的历史观。市民社会的主观自由不以国家和法为中介,而是通过生产关系——以劳动、分配与消费为中介的生产关系得到实现。其突出的矛盾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即是一种由对象化劳动和占有关系所构成的全面异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6] (P41)}。这种异化关系使得市民社会的经济生产中人的本质被异化劳动所抽离,无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当中所谓的、抽象的政治平等主体,却在其具体生存中失去了人道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内涵,资产阶级在其政治宣言中所被包装称文化工业产品的意识形态最终无法掩盖市民社会现实中的人道主义失落。因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不能停留于对市民社会的修补,而是应该展望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被彻底扬弃之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马克思所身处的德国社会而言,即是要“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6] (P14-15)}。

对于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而言,则是要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至共产主义理念之最终实现建构世界历史性的条件。毕竟市民社会本身已经为世界历史性的政治经济变革创造了基本物质和政治条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延续,以及全球性危机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些都预示着市民社会走向自我扬弃的量变积累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加速。同时也要通过以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为例证的历史、思想发展线索,认识到市民社会不断展开的过程既是世界历史作为一切可能性之条件不断形成的过程,也是哲学不断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阿兰·布鲁姆. 巨人与侏儒(1960—1990) [M]. 张辉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 [2] 普拉特纳. 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 [M]. 尚新建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3] Oeuvre Completes de Jean - Jacques Rousseau [M]. Paris: 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 1959 - 1969.
- [4] Jean - Jacques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rans. Roger D and Judith R. Masters [M]. NY: St. Martin's Press, 1964. Second Discourse.
- [5] 德拉·沃尔佩. 卢梭和马克思 [M]. 赵培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6] COLLETTI L. From Rousseau to Lenin [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范扬 张启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恩斯特·卡西勒. 卢梭问题 [M]. 王春华 译. 彼得·盖伊编.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9] 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2.
- [10] 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 [M]. 李洪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 [11] LEVIATHAN T H. Michael Oakshott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陈 萍]

The Evolv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Civil Society With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 Theories from Jean - Jacques Rousseau to Karl Marx

ZHANG Wen-xi, BAO Da-wei

(Philosophy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society was defined by Rousseau's criticism on bourgeois accidentally, however, which unconsciously opened an era of the critique towards the coming capitalist society as well as the usage of dialectics. In Hegel's historicist system,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society was put on the basis of the liberty of ethic, through the unif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dimension and abstract dimens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done by the dialectics. This sidedness or reality of the essence of civil society, along with its facto relation with the state, was revealed and demonstrated by Karl Marx's thorough utilization of dialectics in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heory, also by which,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society was finally grasped as the historical and material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alienation facts.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dialectics; Karl Marx; Jean - Jacques Rousseau; Hegel